

19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小结

2020-10-12 10:17:24

我是一个很形式主义的人，做许多事只是因为我觉得应该这样做而做，比如说出国交流。之前也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来交流，我虽然瞎说了一些登得上台面的理由，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够得上条件的人基本都这样选择了。至于期待收获些什么，如所有人想的一样：英语水平的提高，国外教授的推荐信，增长些见识，以及短暂地逃离一下令我几乎喘不过气的紧张的复旦生活。但是若是现在问我有什么收获，看看这些仿佛是微不足道的，更主要的是对一些问题看法的改变，对自身更深入的认识，对我之所以成为我以及我将如何成为我的思考。

于是在2019年8月，我来到了美国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考虑在报名哪个学校时，我因为对各大学了解并不多，就在网上简单地查查各学校的综合排名和社会学学科排名，于是发现加州大学（UC）排名不错。我当时的成绩挺好的，好像是年级第一，绩点3.75多点那样子，于是想着要报就报个最好的，因此就确定了报名加州大学。校级项目里加州大学是不用自己交学费的，不过有一个“风险”就是被选中参与加州大学的交流项目之后，进入哪个分校是由UC校方分配的。我查了各个分校的排名，按要求选了三所分校：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剩下的那个记不得了。UCB吸引我的主要是它的排名，所以我把UCB排在了第一志愿。在GBO（Golden Bear Orientation）的最后一天，坐在Lower Sproul Plaza附近的高台上，对面Student Union的楼灯火通明，背后夕阳西下，酡红如醉。我的领队给我和在GBO期间新认识的朋友唱完了最后一首歌。是告别的时候了，我看着领队的眼睛，认真地说道：“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有趣的定向了。因为我的英语不太好，我的表达只好过于简单和直白。这一周的日子，或许我可以说，在我一生之中是最为有趣的、多彩的、值得留念的。我对伯克利，对学校，对我们的队伍，对你，和对我自己都感觉好极了。我真的好感谢你。”

这是真的。我从未受过如GBO期间这样密集的积极的评价。每个人都友善极了，都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我常穿着格纹的西装外套，这在满是卫衣的伯村之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同学们常常对我说“我好喜欢你的外套”。粉红色的衬衫、雕花皮鞋，甚至我自己都没怎么注意过的裤子上的小小刺绣都被他们赞美了个遍。用磕磕绊绊地英文和各个同学聊着自己的家乡、专业等等，中途常常来一句“不好意思，我的英语不大好”，然而对方总是正色回答“我觉得你的英语很棒的”、“你的发音不错的”。聊到新学期选课，我总是谈起我因为英语不好而生的对访谈课程的担忧，对方也永远是鼓励我。虽说我自然知道这种积极的回应是我们的习惯罢了，不一定有多真诚的，但是整日在被赞美的环境中待着也实在是心情大好，逐渐相信自己棒极了，对新学期的信心也又增添了几分。



GBO期间我所在的小队合照 因为我的专业是社会学，来UCB之前就已经打听好了，说复旦的质性研究课程耗时太大，于是就在美国修了“Advanced Method: In-depth Interview”课程。这门课是我来之前担心最久，来之后耗时最大的课程，但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课程。这门课意味着，我要用我还不怎么样的英语，在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完全陌生的美国找人进行访谈，然后像练英语精听一样把访谈内容转录为访谈稿，最后用英语写成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然而，当我开始着手做我的访谈课程的课题时，我发现与其他种种困难相比，语言上的困难不值一提。虽然Professor Enriquez的办公室里总是阳光灿烂，她常常带着笑意的眉眼也是极美，我在她的回应下总是再度充满希望，但是一走出Barrows Hall 432号房间，焦虑马上又涌上心头。在异文化的背景下做质性访谈，各种逻辑总是难以一时理解。比如在我初次访谈的时候，本期望对方会讲芭蕾舞之优雅，然而访谈对象屡屡提及的“健康”话题却令我疑惑不解，几度揣测又几度推翻自己。然而这却让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图景，让我进一步思考我原处设想的课题中更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连招募这件看起来顶普通的事情让我经历了一次认知上的改变。在我最初的经验里，找访谈对象最好是能攀上关系的人，毕竟只有这样人家才会卖给我这个人情；而暗地里受挫了几次，才换上了真正的“招募是完全自愿参与的”心态。

不过之前“攀交情”的心理作为部分原因促使我加入了UCB的两个芭蕾舞社团（其中一个bCourse课程而已）。但是既是出来交流，我哪里会这样功利，跳舞自然不全是为了招募，跳舞本来也是令我极快乐的事情。上午上完法语课，在外吃个午饭，我便来到有高高的穹顶的Doe Library自习。周一和周三时候，当那扇巨大的窗户漏出的一小角的天空颜色逐渐变深，我也累了，也饿了。这时，我再等上一个小时，就可以短暂地离开这个让我目前疲惫了的世界，走进Hearst Gym，走进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



这学期与芭蕾相关的另一个高光记忆便是我去看了两场演出。来美国之前，我觉得能在圣诞节前后看一场《胡桃夹子》也是极美好的了，然而在此之前，马林斯基芭蕾舞团将来伯克利演出的消息给了我一个更大的惊喜。这是全世界最好的芭蕾舞团啊！11月初在校内的Zellerbach Hall看了《舞姬》，12月末去旧金山歌剧院看了我期待已久的《胡桃夹子》，于是我便再没什么遗憾了。



《舞姬》 在旧金山看《胡桃夹子》的演出时，真的是衣香鬓影，人人都盛装出席。一个让我帮她全家拍张照的女人妆容万分精致艳丽，身穿红色长裙，外披一件半袖黑色皮草；站在我前面的一个小男孩一头金色的头发，穿着红色的西装，奶声奶气又一本正经地跟一位叔叔说，“您好，我的名字是xx”。旧金山歌剧院的对面是雄伟的旧金山市政厅，大楼前面绿草如茵。然而，我来时误走的是这个街区后面的那条街。那条街是流浪汉的领地，肮脏的、充斥着刺鼻的味道的街道上搭了几个帐篷，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或者坐在一起，但又似乎不说话。我一个人匆匆走在马路上，吓得几度想要哭出来。谁能想得到，再向前走几分钟，就是另一番天地了呢？这学期我上了Professor Lie的东亚研究课程，他讲到美国早已抛弃了国家主义的封闭的框架，然而随之抛弃的也有收入上的平等。一街之隔，差距之大，实在令人感慨不已。

Bay Area这片的流浪汉真的好多。当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从旧金山机场坐Bart（类似于地铁）前往住家时，就遇上了一个骂骂咧咧的流浪汉。我一个人坐在Bart上，一边紧握着行李箱，一边偷偷察言观色，心里紧张得不得了。到了家里，就在去超市Safeway不足五分钟的路，我走几步便能看见一个潦倒的、脏兮兮的人迎面走过。房东告诉我们要不理他们便是。我所见的流浪汉确实也没做过什么，最多只是大声咒骂而已。我多次好奇他们究竟在骂什么——他们认为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晚上要睡在井口上。是政府吗？是总统吗？还是他们的神呢？然而因为我实在听不出来而作罢。这时候，我时常自嘲，暗暗觉得好笑。毕竟在中国，一个英语流畅的人常常被认为是文化精英。而我作为一个精英大学里的学生，英文竟不如一个街头流浪汉。这个自嘲自是荒唐。可是在加州待久了才越发体会到“语言就是一个工具”的意思。加州，或许以至于整个美国，人口的多样性远远大于中国。各色皮肤的人，有着各种母语的人，操着各种口音的人……人人说英语主要是为了沟通的便利，然而又因为来自各地说起英语不免有各种口音。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学生，说英语磕磕绊绊，发音不准自是在所难免。他们都能够理解这一点，我也就不畏惧开口说话了。我总梦想着什么时候我的英语好到能像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一样自然，至于好到什么样子，大概就是“想说啥说啥”，以至于我因为在一晚的梦居然讲的是英语而兴奋不已（那是在迎新周里，大概因为每天频繁参与小组的讨论所致，讨论内容包括文化多样性、性与性别等较复杂的主题）。然而全球化与多样性将我认为的这种理所当然的关系打破了。有一次和David聊天，他说他父母是意大利人，而他家在伦敦（我一直将他当作伦敦人）。我们问他：“那你以后是打算住在意大利还是英国？”他竟答道：“我想是英国吧。因为我的英文要比意大利语好许多。”我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哪里有自己的“母语”不够好的道理！

说起David，我们俩是在URAP中Professor Swidler的项目组里认识的，他来UCB交换一年。我们两个大概是作为“少数”被同组的Mei邀请去她家过感恩节。我之前一直以为Mei念大四只比我大一岁，在她来接我们的路上才得知她今年28岁，已经结婚七年了。她将毕业得这样晚是因为她之前生了病，后来大概是为了补贴家用去工作，因此每学期可以少修一些学分。而她更加“离经叛道”的则是她决定继续读博。“我实在是喜欢我自己现在在做的这个项目，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没有人知道你究竟是对还是错。他们说你错了，可能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对的。”进了她家，我们还认识了她的邻居。他来自东南亚，已是一个男孩的父亲了，他在这里读生物学。他说，他发现了一种病在美国无人研究，而他愿意致力于此，使那些患病的穷人得救。David讲起他小时候随父母在非洲生活过几年，因为他的父母为非洲的发展组织工作。相比之下，我的经历显得平淡无奇。怎么说，就像是少了一份驰骋于世界的胸襟和豪情壮志。然而他们却夸赞我的勇气：“你一个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这里的语言还和你的母语完全不一样。而且你还是一个女孩！”



感恩节时摄于Mei家中 在12月中上旬，Mei再次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去过Friendsmas（大概是朋友之间交换礼物）。我们交换过礼物之后，Mei说她另有礼物送给我。竟是一个相框！里面的照片一张是我和David的合照，一张是我抱着他们家的小狗（他们家的小狗尤其喜欢我，而我从小就怕狗，见狗就躲得远远的，却敢轻轻地抚摸他们家的小狗。多可爱的小小的躯体！）。与相框在一起的还有一张贺卡，里面写了长长的话。在回去的路上，她说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在项目组里也经常提出新鲜的观点，她相信我一定可以实现我的目标。 我所在的URAP组的课题是马拉维的宗教。我既不了解宗教，更不了解非洲，文化上的不一致让我感到处处新奇。加之在看了Professor Swidler给访谈稿做的或惊喜、或愤怒、或同情的几处批注之后，我常常要求自己在阅读访谈稿时保持兴奋、敏感、感兴趣的状态，因此我经常会兴致勃勃地提出一些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观点。而Professor Swidler永远给我们耐心地解释原因。有时我们的观点让她想起了别的主题，她则会认真地在电脑上记下来，有时我们的观点还会最终化为一个小小的编码。每周四的中午，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在跟一位大学者一起工作，一起完成一个项目，我觉得我自己有价值极了。 Professor Swidler确实是一位在学术界非常有名望的学者，然而当我知道她提出了那些著名的理论其实是很以后的事情了。我如何感到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呢？通过她在访谈稿上简单的批注，我能够清楚地感到她做研究时发现新东西时的雀跃。她头发全白，拿东西的手颤巍巍，但讲起她的研究，神情之欢愉宛如少女。访谈稿里谈及当地首领（chief）的腐败，她在批注中痛骂“Bad chief!”；访谈对象说起自己的贫穷，她批注“令人酸楚的（poignant）”；当他们说起自己决定斋戒是因为否则要白白地给斋戒的人食物，她批注说“cute logic”。我因此明白了什么叫做悲悯。



项目结束后的RRR Week（没有课的期末复习周）里，教授请我们一起吃了饭 在UCB，我常常感到我自己很棒，感到我被尊重，被当作一个有希望、有热情的学生，被当作一个未来的学者。我的热情永远能够得到回应，而不是我说着笑着比划着，对方只是冷静地点点头。我对Professor Enriquez说我已经找到五个访谈对象啦，五十多岁头发半白的教授激动地大声说：“That's great! That's great!” 每周四从Barrows Hall 444号Professor Swidler的办公室出来，我都觉得我浑身充满了力量，头脑里常会响起《欢乐颂》——那是一屋子彼此相信对方终将有所成就的人。于是我也深信我有我自己的天赋和才华，不可埋没的才华；我相信我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终将战胜一切束缚和羁绊的未来。我是无限自由的。 说起美国的自由，美国人常常说他们是有着极其充分的free will的，即使不明说，通过他们的话语你也能深深感到他们对于自由的重视和捍卫。有人百分百地肯定它，也有人质疑它。一日在Mei家中闲聊，说到是什么让美国强大，Mei说他们从小被教育说答案是free will，但是自由意志真的仍然在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吗？说起中国，美国人常常遗憾地说“你们没有言论自由啊”，他们不见得是出于嘲讽的、具有攻击性的坏心，而是真的感到震惊和替人难过。他们说他们可以批评政府，大谈国家政治，但是这时我总想若将自由作为手段，这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形式还是值得考量。 然而我在美国感受到的我认为的真正的自由是一种类似人性的自由，是不在条条框框中活着，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我可以凭我的天赋去做一切想做的事，争取达成哪怕是遥不可及的目标。没有人嘲笑我异想天开，没有人质疑我能力不足，没有人一遍遍地说道路艰难，我以后或许后悔。我的才华和梦想不受束缚，恣意汪洋。我就是我，是一个逻辑自洽的个体，而不是根据大众的一条条标准在自己的履历表的方框中打勾。 让我感到轻松自在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这里较为缓慢的生活节奏。虽然Mei曾抱怨美国的生活节奏太快，学校的课程太多，但是这与我在中国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学校附近多山，坡路一条连着一一条，大家的住所离学校也都不近，每天上学放学大概走个几十分钟。最初我觉得这时间浪费得实在可惜，但是在山路上也实在是走不快，于是转而欣赏每天都瑰丽无比的晚霞。若是从学校走得晚，天全黑了，也可以看星星。期末时候，一天我提交完论文已是晚上十二点，街上空无一人。仰头看天，条条云彩冷而轻薄，月亮冷而皎洁，清澈的天空让人

疑心上面真的有宫殿。不自觉地哼起苏轼的《水调歌头》，一句句细细品味，琢磨意思，念到“我欲乘风归去”，突然觉得苏东坡的境界还是更加广大，以为天上有琼楼玉宇便欲上天。我一个小小的人，站在这样广阔的天空之下哪里有这样大胆的上天入海的想象。大概是生活在现代反倒让我更小了。



每晚都好美，都想拍下来的晚霞 与Mei等朋友们聊起现代美国，她抱怨起了人之冷漠。她说人们问你“**How are you**”，然而他们并不关心你说了什么。我暗暗惊讶，毕竟我初来美国时觉得他们热情得很，不管是真心还是不真心的问候都让我感觉很好。**David**附和说他有一次问候朋友，他的朋友却问他有什么事情，“我联系你为什么一定是要有什么事情呢”。和朋友维持关系保持联络的事情我和我的室友也聊过，我们俩后来一致觉得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相麻烦出来的。这自然不是工具理性、以相互利用为宗的意思，只是这样才有了联络的理由，“有事找你”大概是一种很有效的维持人际关系的方式。说来好笑，在Mei家中聊现代美国正是感恩节那天，不管我们说什么都绕不开说美国不好的一面。**Mei**的丈夫说：“今天是感恩节诶，我们不能全说不好的哇。”大家绞尽脑汁却依然沉默，**Mei**的丈夫开口，问**David**和我来到美国有没有发现哪里和家里不一样的。**David**说他发现在美国，在一群人之中，人们往往相信的是声音最大的那个。他们问我中国是如何，我想了想说，是最有名望、最该受尊敬的人最会为人信服。“崇拜权威”被我们批判了许久，没什么好再讨论的了，而**Mei**想想却说，“我们确实缺少尊重。毕竟是那些人使我们能过上现在的生活，成为现在的样子”。那晚我们聊了许久，基本是我以为是的，他们以为非；我以为非的，他们以为是。在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中国很久以来想要变得更好，即更加现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变得更加**western**。然而当西方开始反思，意识到许多事情已经出现了问题，而我们却依然在追捧和效仿。



一边吃着火鸡，一边聊天，畅快极了。在外，特别还是在最发达的国家，总是免不了将美国与自己的祖国处处比较，带有情感和价值判断地处处比较。虽然和朋友们吐槽过美国种种，但是也暗暗记下了中国远不如美国的种种。所不如者，设施上的硬件并不多，更多的则是人的精神状态上的，一种更加接近心理和精神上的自由。残疾人一个人坐着轮椅自如地上街、坐公交，他自己不觉得有何异样，周围人也不觉得有何异样。说起就业，答案多种多样，没有很多人回答“经济、金融”，好多人说着“不那么赚钱”甚至“不那么稳定”的工作。在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我又总是天真地禁不住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果然要建立在极发达的生产力之上呢。我们实在是 不够富裕。学期结束后，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到纽约旅游。2019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坐着环绕自由女神像的轮渡，吹着海风，船上放着《Welcome to New York》。朋友指着指着绵绵不绝的曼哈顿城市天际线问，“你说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呢？”



曼哈顿 （注：文中名字皆为化名）